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政治史学丛编  
刘小枫◎主编

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国王两个身体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德]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 著

徐震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rnst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国王的两个身体  
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德] 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 著  
徐震宇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王的两个身体/(德)康托洛维茨著;徐震宇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5675-6692-7

I. ①国… II. ①康… ②徐…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德国—近代 IV. ①D7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284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 国王的两个身体

著 者 (德)康托洛维茨

译 者 徐震宇

责任编辑 赵元 倪为国

封面设计 姚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6.5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2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692-7/D·211

定 价 1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出版说明

古老的文明共同体都有自己的史书，但史书不等于如今的“史学”——无论《史记》《史通》还是《文史通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严格来讲，史学是现代学科，即基于现代西方实证知识原则的考据性学科。现代的史学分工很细，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种种主题都可以形成自己的专门史——所谓的各类通史，实际上也是一种专门史。

不过，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兰克并非以考索史实或考订文献唯尚，他反倒认为，“史学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人都会怀疑其真实性的可靠处方”。史学固然需要探究史实、考订史料，但这仅仅是史学的基础。史学的目的是，通过探究历史事件的起因和前提，形成过程和演变方向，各种人世力量与事件过程的复杂交织，以及事件的结果和影响，像探究自然界奥秘的自然科学一样，“寻求生命最深层、最秘密的涌动”。换言之，兰克的史学观还带有古典色彩，即认为史学是一种政治科学，或者说，政治科学应该基于史学，因为，“没有对过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的认知”，政治科学就不可能。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涉及人的行为的纪事”，“对于了解政治事务”有益（《修辞术》1360a36）。正如施特劳斯在谈到古代史书时说：

政治史学的主题是重大的公众性主题。政治史学要求这一重大的公众性主题唤起一种重大的公众性回应。政治史学属于一种许多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生活。它属于一种共和式政治生活，属于城邦。（施特劳斯，《修昔底德：政治史的意义》）

兰克开创的现代史学，本质上仍然是政治史学，与 19 世纪后期以来受实证主义思想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影响而形成的专门化史学在品质上截然不同。在古代，史书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系在一起。现代史学主流虽然是实证式的，政治史学的脉动并未止息，其基本品格是关切人世生活中的各种重大政治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出现在古代还是现代。

本丛编聚焦于 16 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史学传统，译介 20 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与选译近代以来的历代原典并重，为我国学界深入认识西方尽绵薄之力。

刘小枫

2017 年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人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	1
前言·····	65
导论·····	71
第一章 问题:普劳登判例报告·····	76
第二章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	97
第三章 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	120
一、诺曼无名氏·····	120
二、亚琛福音书的卷首画·····	141
三、永恒性的光环·····	170
第四章 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	180
一、从礼仪到法律科学·····	180

二、弗里德里希二世·····	191
正义之父与正义之子·····	191
作为中保的正义·····	203
三、布雷克顿·····	250
王低于和高于法律·····	250
基督-国库·····	272
<b>第五章 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奥秘之体</b> ·····	305
一、教会的奥秘之体·····	306
二、国家的奥秘之体·····	320
三、为祖国而死·····	348
宗教和法律性的祖国·····	348
爱国主义宣传·····	366
国王与祖国·····	377
<b>第六章 论延续性与合众体</b> ·····	392
一、延续性·····	392
永常·····	394
永远的必需性·····	403
二、真理的形象化拟制·····	411
帝国是永久的·····	411
共同体不死·····	423
<b>第七章 国王永远不死</b> ·····	437
一、王朝延续性·····	440
二、作为拟制的王冠·····	461
可见与不可见的王冠·····	461
财政性的王冠·····	467
不可让渡性·····	472
王冠与共同体·····	484

国王与王冠·····	490
作为未成年人的王冠·····	499
三、尊荣永远不死·····	511
不死鸟·····	513
英格兰的合众体现象·····	531
国王死了·····	539
拟人像·····	553
国王作为尊荣的工具·····	576
第八章 以人为中心的王权:但丁·····	590
第九章 尾论·····	638
图片目录·····	651
缩写表·····	659
参考文献·····	661
索引·····	676
译后记·····	731



## 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人民主权政体的政治神学和史学问题

刘小枫

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 1895-1963)出版《国王的两个身体》(1957)那年,刚60岁出头。6年后,这位个性倔强的中世纪史学家便带着德意志帝国的秘密梦想在美国与世长辞。

康托洛维茨出生在普鲁士早前从波兰切割来的波茨南土地上,人文中学毕业后没多久,遇到第一次欧战爆发,便自愿参军上了西线战场,在凡尔登战役中负伤,颇有血性。战争结束后,康托洛维茨才上大学,先在柏林读了一学期哲学,又转到慕尼黑,最后落脚海德堡大学,修读国民经济学和古代史。26岁那年(1921),以穆斯林手工业行会为题取得古代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后,康托洛维茨在海德堡大学谋得编外讲师教职,但并非为了搞学术,而是为了不离开格奥尔格圈子(George-Kreis)。六年后,32岁的康托洛维茨出版了大部头传记体史书《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1927),随即名噪一时。<sup>①</sup>作为格奥尔格圈子的第三代核心成员,康托洛维茨的这部传记体史书并非要在专业史学方面有所建树。毋宁说,

<sup>①</sup> Ernst H. Kantorowicz,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Düsseldorf / München: Georg Bondi, 1927/1963/1974/1994。

与差不多一百年前德罗伊森的《亚历山大大帝》(1833)一样,康托洛维茨希望用自己的历史人物传记唤醒某种德意志精神。<sup>②</sup>

欧洲大战尚未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1918)自行崩溃。对某些德国智识精英来说,德国并非败在军事战场,而是败在自家的文化战场——败在德国知识界深受自由主义共和论毒害。在国民心绪低迷、愤懑、惶惑的历史时刻,为了打破德国智识人的共和迷思,具有超凡精神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给自己的“圈子”拟定了一个写作计划,让德国人民回想欧洲历史上那些在种种艰难时刻坚守高贵精神的各色人物。康托洛维茨主动请缨,为700年前的德意志帝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194-1250,旧译“腓特烈二世”)作传。<sup>③</sup>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问世第二年,刚过60大寿的格奥尔格出版了平生最后一部诗集《新帝国》(*Das neue Reich*, 1928),以抒情诗形式书写史诗,歌咏德意志民族的历代英雄人物(包括当时的兴登堡总统),从形式上看颇得品达遗风,实质上志在传承古希腊诗人忒奥格尼斯(约公元前585-540)的精神品格。<sup>④</sup>《新帝国》结尾时,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诗人唱到:“我把远方或梦之奇迹,带着前往我国的边地”。<sup>⑤</sup>所谓“远方或梦之奇迹”,指欧洲尤其德意志历史上那些优异人物曾展现出的高贵精神品质,如今,诗人企望“秘密的德意志”(das geheime Deutschland)即格奥尔格自己的精神同仁圈子承载这一梦想。

② 德罗伊森,《亚历山大大帝》,陈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比较 Ernst H. Kantorowicz, “Kaiser Friedrich II. und das Königsbild des Hellenismus”, 见 Ernst H. Kantorowicz, *Selected Studies*, New York: Locust Valley, 1965, 页 264-283。

③ Eckhart Grünewald, *Ernst Kantorowicz und Stefan Georg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des Historikers bis zum Jahre 1938 und zu seinem Jugendwerk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 Wiesbaden, 1982; Thomas Karlauf, *Stefan George. 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 München, 2007; Ulrich Goldsmith, *Stefan Geor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Michael Winkler,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George Circle”, 见 Jens Rieckmann 编,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Stefan George*, 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5, 页 145-159。关于魏玛时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参见米尚志编译,《动荡中的繁荣:魏玛时期的德国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④ 参见拙文,《城邦航船及其舵手》,刘小枫,《比较古典学发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 8-11。

⑤ 格奥尔格,《词语破碎之处:格奥尔格诗选》,莫光华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页 200。

这首压轴诗题为“词语”，结尾句因海德格尔的解释而非常著名：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这个带定冠词的“词语”(das Word)寓指什么？若理解为格奥尔格心目中的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精神不会离谱，因为诗人唱到：

我苦苦守候命运女神  
从泉源寻得它的名称  
随即我将它牢牢握住  
如今它光彩穿越疆土  
我也曾历经漫漫长途  
带去一颗柔美的珍珠。

可是，

它随即从我指间遁逃  
我国就再未获此珍宝。

诗人暗示，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精神品质有如“一颗柔美的珍珠”，它一旦破碎，德意志帝国便一无所是。珍珠丢失，尚可能复得，一旦破碎，便永不可能复得。诗人的歌唱明显带有现实关切，因为，在诗人看来，魏玛宪法的德意志共和国仍然沿用 Reich[帝国]这个习传“名称”，无异于自欺欺人。德意志正在变得庸俗不堪，作为一个国家，德意志的土地上不能没有高贵的精神品质。国家即便强盛起来，也不等于有高贵精神。格奥尔格手上的那颗“柔美的珍珠”，就是高贵的德意志精神品质本身，在“新帝国”的大众民主处境中，诗人极为忧心，这颗“柔美的珍珠”不是丢失，而是彻底“破碎”。

《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与《新帝国》交相辉映，销量惊人，短短几年内，康托洛维茨的这部历史人物传记获得的报刊书评，已近两百篇，

1931年印行第三版，英译本也在同年面世。因从未打算搞学术，康托洛维茨念完博士学位后，并未按部就班写教职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这时却收到法兰克福大学的史学教授聘约。史学专业的某些科班教授妒忌心起，撰文攻击《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一个没有注释，不过是“历史通俗文学”，毫无学术价值。<sup>⑥</sup>康托洛维茨不仅在很短时间内搞出一部史料集，回击这些心胸狭隘、心性低劣的专业学匠，还决定自己这辈子也搞学术。

1933年接踵而至，身为犹太人的康托洛维茨磨蹭到欧战爆发前，才秘密逃亡英伦。在英伦没能找到立足之地，度日艰难，康托洛维茨偶然从报上看到一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招聘史学教授的广告，撞上好运移居美国。1950年代初，因麦卡锡事件与校方闹别扭，康托洛维茨又离开加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那里完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离世时还未年届古稀。

在美国，康托洛维茨的知名度从未越出古代史专业范围。即便在欧洲学界，也差不多有近20年之久，没人对康托洛维茨谈论的“国王身体”感兴趣，即便古代史专业人士，读这本书的也不多。福柯在《规诫与惩罚》(1975)卷一第一章“犯人的身体”临近结尾时，用半页篇幅概述过《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大意，如今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美谈，似乎福柯慧眼识珠，第一个发现康托洛维茨。<sup>⑦</sup>其实，福柯提到这部书，与康托洛维茨要谈论的问题了不相干。福柯满脑子“犯人的身体”，而非“国王的身体”，他并不关心康托洛维茨所关切的问题。毋宁说，让福柯钦佩的不过是，康托洛维茨的学识极为丰富，史述笔法诱人。倒是2年后，有个研究英国近代史的学者出了一本书名为《女王的两个身体》，明显是在模仿《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论题。<sup>⑧</sup>

在德语学界，人们对这位魏玛民国时期的青年才俊，也已经忘得差

⑥ Henning Ottmann, *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 Das Mittelalter*, Stuttgart; Metzler, 2004, 页 183。

⑦ 福柯，《规诫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2003/2007/2012，页 31。

⑧ Marie Axton, *The Queen's Two Bodies: Drama and the Elizabethan Successi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tudies in History, No. 5, London; Humanities Press, 1977。

不多了,少数老辈人记得康托洛维茨,不过因为他曾是格奥尔格圈子的最后一代才子之一。<sup>⑨</sup>康托洛维茨去世那年(1963),《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重版。在“波恩条约”框架下,德国学人不再会对这位中世纪的德意志帝王感兴趣,完全可以理解。1990年代初,《国王的两个身体》有了德译本,中世纪史研究的名家福尔曼在《时代周刊》上发表推介文章,标题是“接康托洛维茨回家”——言下之意,德国人不应该忘记,康托洛维茨是德国人,而非美国人。<sup>⑩</sup>在德国才应该会有人对“国王的身体”念念不忘,美国人怎么可能对“国王的身体”有感情呢。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1989),《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法文和意大利译本同年出版,德文译本才接踵而至(1990)。在随后10年里,这部书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关注者主要并非是中世纪史学专业的从业者,大多是关切政治思想史问题的人士。一时间,欧美大国越来越多的政治智识人开始关心“国王的身体”,好几部专著甚至模仿康托洛维茨的书名。即便是普及性的学术书,也以引用康托洛维茨为尚。<sup>⑪</sup>《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影响力在公共学界持续上升,康托洛维茨的声誉明显越出专业史学领域,传记研究接连不断——康托洛维茨俨然成了历史人物,而非一般学人。<sup>⑫</sup>

## 一、不死的国王身体

《国王的两个身体》为何籍籍无名长达近20年,又为何突然之间走红,学界不免会出现种种解释。<sup>⑬</sup>法国学界有人给出这样的解释:1960

⑨ Arthur R. Evans 编,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⑩ Horst Fuhrmann, “Die Heimholung des Ernst Kantorowicz”, 刊于 *Die Zeit*, 13/1991, 页 1-13。

⑪ Bernhard Jussen, “The King’s Two Bodies Today”, 刊于 *Representations*, Vol. 106, No. 1 (Spring 2009), 页 104。克鲁瓦/让·凯尼亚,《法国文化史,卷二: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1997/1998),傅绍梅、钱林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 261。

⑫ Alain Boureau, *Kantorowicz: Stories of a Histori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 Lerner, *Ernst Kantorowicz: A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⑬ 参见 John B. Freed, “Ernst Kantorowicz: An Accounting”, 刊于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32, No. 2 (1999), 页 225-226。

年代崛起的年鉴学派势力太大,《国王的两个身体》属于观念史论著,方法老派,无人问津并不奇怪。德语学界的情形也相差无几: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影响太大,自1930年代起,就支配着学界的问题意识乃至研究方法,没谁关心中世纪晚期的观念史问题。何况,康托洛维茨所谈论的国王身体,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这番解释固然没错,却未必周全,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何偏偏在1980年代以来,康托洛维茨越来越红。在笔者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面世后遭遇冷落,实际原因是当时英美学界正在兴起一股激进民主思潮,出现了强势的所谓“思想史的民主化形式”。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气候中,康托洛维茨谈论国王的身体,不仅堪称老朽,而且政治不正确。剑桥学派史学在1960年代的激进民主运动中登上学术舞台,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大显身手,随即吸引了广泛的学界目光。1981年,法国著名思想史家戈歇(Marcel Gauchet)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解读《国王的两个身体》,明显是在借康托洛维茨之作,回应激进民主的政治史学。<sup>⑭</sup>戈歇以研究贡斯当和托克维尔闻名学坛,同时也是法国文化思想界抵御激进思想的中坚人物。他大声疾呼,拉康、福柯、德里达谋杀了法兰西文明精神,振聋发聩,我们迄今没听见,还以为法国后现代思想会让中国文明精神发扬光大。<sup>⑮</sup>康托洛维茨在1980年代末开始逐渐走红,未必不可理解为,激进民主的政治史学开始遭遇反弹。毕竟,剑桥学派史学与康托洛维茨史学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问题意识却截然对立。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法意德译本纷纷面世,绝非偶然。法国革命起初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这意味着,国家这个身体的“头型”换了,但“头”还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个君主国联手干预法国政局时,路易十六王后泄露军事机密,致使普奥联军击溃

<sup>⑭</sup> Marcel Gauchet, “Des deux corps du roi au pouvoir sans corps. Christianisme et politique”, 刊于 *Le Débat*, 1981/8 n° 14, 页 133-157 及 n° 15, 页 147-168。

<sup>⑮</sup> Marcel Gauchet, *Desenchant Du Monde: Un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eligion*, Paris: Gallimard, 1985 (英译本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lig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cel Gauchet, *La religion dans la démocratie: Parcours de la laïcité*, Paris: Gallimard, 1998; Marcel Gauchet, *Pensée de Marcel Gauchet: Philosophie de la démocratie. Ecriture de l'histoire*, Paris: Frémeaux & Associés, 2009。

法军,攻入法国本土。1792年7月,立法议会宣布,国家进入危急状态;8月,共和党人发动市民起义,占领杜伊勒里宫,拘禁国王和王后,宣布推翻立宪派政权。共和党人中的温和派(吉伦特派)掌握政权后,迫使立法会议废除君主立宪制,改行共和制,共和党人中的激进派(山岳派)则还要求处死国王。9月,法国军队和各地组织的义勇军在瓦尔米一役击溃普奥联军,为法兰西共和国(史称第一共和)奠定了基础。10月,法国军队已经将普奥联军赶出国境,还间接控制了意大利半岛和莱茵河以西。一百年来,法国从未取得过如此胜利。1793年元月21日,国民公会在一片胜利声中以叛国罪判处国王及王后死刑,路易十六身首分离。随之,保王党人与革命党人爆发激战,国家即将陷入分裂。

人民主权的国家这个身体可以没有“头”吗?拿破仑铁腕平定内乱证明,人民的国家作为一个身体,仍然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头”,否则只会瘫倒在地。

共和革命党人掌控的国民公会以法律程序方式处死国王,从世界史的意义讲,是在确认一百多年前英国共和革命弑君的正当性。按19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基佐的说法:法国革命不仅给英国革命“增添了鲜明光彩”,甚至应该说,没有法国革命,“就无法彻底理解”英国革命。<sup>⑩</sup>1649年元月20日,处于内战状态中的英格兰残余议会设立法庭,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一周后,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应予斩首”。随后,查理一世在白厅街被当众斩首。世界历史上被推翻的王权不计其数,英国的共和革命以法律程序合法地判处国王死刑,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学习政治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的人会觉得,这一事件的历史含义值得深思。激进共和主义者则会通过写通俗文学式的史书说,这一历史事件是值得人们“一同分享和欣赏的人权历史上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带来的激动,所有欧洲人对社会阶层地位以及‘君权神授’的假设,都被一个概念粉碎,那便是:‘权力应该属于人民,并由人民的代表去行使’”。<sup>⑪</sup>

<sup>⑩</sup> 基佐,《1640年英国革命史》,伍光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007/2011,页7-10。

<sup>⑪</sup> 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徐璇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页8。

在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看来,英属美洲殖民地十三州的“独立”革命,先于法国革命确认英国共和革命的正当性。《独立宣言》控告英王的法理依据,与英格兰下议院控告国王的理由如出一辙:国王身上仅有“有限的权力”,其职责是确保人民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让渡的权利”;一旦国王的有限权力损害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利弑君。与基佐不同,沃格林还看到,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对国王提出指控有一个根本差异:英国的共和革命人士设立高等法院来裁决对国王的指控,美洲殖民地的共和人士则把对英王的指控直接提交“人类的意见”(the opinions of mankind)裁决。<sup>⑮</sup>“人类”是谁?“人类”既可等同于自然天地,也可等同于上帝。这一差异表明,英国共和革命之后的一百年里,基于人民主权的共和理论高歌猛进,占领了舆论制高点,《独立宣言》废黜宗主王权的控告,已经无需再由高等法院之类的人间机关来裁决。

由此来看,法国革命党人中的温和派依循法律程序审理对国王的指控,无异于一种历史倒退。法国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期间,罗伯斯庇尔两次发表演说,他的观点让我们看到,沃格林所言不虚。罗伯斯庇尔向来主张废除死刑,在他看来,死刑“极端不公正”,“社会无权规定死刑”,何况,死刑有违“自由民族的善良风习”云云。既然如此,罗伯斯庇尔为何极力主张处死国王?在他看来,道理很简单:死刑属于刑事犯罪,国王路易十六犯的则是叛国和反人民的政治罪,岂可同日而语。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讲时振振有词地说,将“我们当中因某种恶习或情欲而违反法律的人”判处死刑,极不人道,处死国王则天经地义。<sup>⑯</sup>因此,设立法庭审判国王实属荒唐:

路易不是被告人。你们不是法官;你们是政治家,是国民的代表……从前路易是国王,而现在建立了共和国。单是这句话,就能

<sup>⑮</sup> Eric Voegelin, *The New Order and Last Orienta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9, 页 84-85。

<sup>⑯</sup>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7,页 68,70,73-74。



解决你们所研究的臭名昭著的问题。路易由于自己的罪行被迫退位；路易宣布法国人民是造反，为了惩罚人民，他呼吁自己同类的暴君使用武力。可是，胜利和人民认定了，叛徒就是路易本人。由此可见，路易不能受审判，因为他已被定了罪，不然共和国就没有理由存在。建议不管怎样也要把路易十六交付审判，意味着倒退到君主立宪的专制制度。这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使革命本身成了有争议的问题。……人民审判不同于法庭审判：他们不下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革命法制和审判》，前揭，页104-105,107）

罗伯斯庇尔的激进共和主义观点自有其理：共和国的合法性已经取代了国王的合法性，或者说，人民主权原则已经取代了王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来自人民的“政治美德”，剑桥学派史学张扬的正是这种罗伯斯庇尔式的共和主义美德。20世纪的人们遗忘了这种公民参与式的“政治美德”，让剑桥诸君深感焦虑。他们通过政治思想史宣扬“公民共和主义”，积极发掘其直接民主的思想意涵，不外乎要进一步教育人民群众：共和国作为人民的身体不应该再有“国王”这个“头”。由此可以理解，剑桥学派史学为何特别关注两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至英国共和革命之前的反王权论，按照这种理论，君王无不是“暴君”。其次是在“1649年弑君和英国正式宣布为‘共和国和自由国家’之后”的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和派自由国家论，据斯金纳说，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的人民主权论，经斯宾诺莎和卢梭的发展，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独立革命。<sup>②</sup>

剑桥学派史学致力于给人们灌输激进共和主义的思想谱系，康托洛维茨的《国王两个身体》展示了另一种共和主义思想，难免会影响剑桥史学的宣传效力。不过，这本书并非面向知识大众说话，因为，它促使还愿意独立思考的少数人思考所谓“政治神学”问题，知识大众不会思考这类问题。康托洛维茨让人们看到，15世纪的英格兰法学家们

<sup>②</sup> 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页9。